

隋唐五代卷

倪进 赵立新 罗立刚 李承辉 著

中国诗学史

鹭江出版社

陈伯海 蒋哲伦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陈伯海，蒋哲伦主编；倪进等著．—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9

ISBN 7-80671-136-8

. 中... . 陈... 蒋... 倪... . 诗歌
史 - 中国 - 隋唐时代 诗歌史 - 中国 - 五代十国时期
.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9428号

中国诗学史

隋唐五代卷

陈伯海 蒋哲伦主编

倪进 赵立新

罗立刚 李承辉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编：361004）

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33号 邮编：350001）

开本 890×1240 1/32 11.625印张 4插页 263千字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71—136—8

I·34 定价：23.50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长期课题研究成果之一。全书共分七卷，前六卷按历史朝代分编，起于先秦，迄于清末，每卷详述一个时期的诗学状况；另设《词学》一卷，综述词学的发展历程。本书以诗歌理论的演进为经，以诗歌的各类活动为纬，将诗学观念与接受主体、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阅读、批评、写作诸环节的展现相结合，建立起一种以诗歌的接受史为视角，用接受范式来整合多元材料的论述模式，进而架构起历史与逻辑相互结合的理论体系。

中国诗学史总目



Z O N G M U

中国诗学史导言 （陈伯海）

总论：中国诗学观念的流变 （陈伯海）

先秦两汉卷 （翁其斌）

魏晋南北朝卷 （归青、曹旭）

隋唐五代卷 （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

宋金元卷 （黄宝华、文师华）

明代卷 （朱易安）

清代卷 （刘 诚）

词学卷 （蒋哲伦、傅蓉蓉）

后记

中国诗学史

- 先秦两汉卷（含导言、总论）
- 魏晋南北朝卷
- 隋唐五代卷
- 宋金元卷
- 明代卷
- 清代卷
- 词学卷

目 录

第一章 概说

- 第一节 隋唐五代诗学的社会背景 / 1
- 第二节 隋唐五代诗学的风貌特征及其流变历程 / 11
- 第三节 隋唐五代诗学的地位和影响 / 23

第二章 隋及唐前期诗学（上）

- 第一节 复古与新变并行的隋代诗学 / 26
- 第二节 略具通变意识的唐初诗学 / 54
- 第三节 上官仪、元兢等人的新变诗学 / 69
- 第四节 复古与通变并存的四杰诗论 / 84

第三章 隋及唐前期诗学（下）

- 第一节 以复古为通变的陈子昂诗论 / 101
- 第二节 崔融、张说对宫廷诗学的沿革 / 111
- 第三节 盛唐通变诗学的实践与理论 / 125

目 录

第四节 唐前期诗学理论形态的成熟

——王昌龄《诗格》 / 144

第四章 唐中期诗学（上）

第一节 集大成与开风气

——杜甫的诗学思想 / 159

第二节 独倡“风雅”

——元结的诗学观 / 173

第三节 清新淡雅的大历诗风与诗学观念 / 179

第四节 主情主意诗学的理论融会和导引 / 189

第五章 唐中期诗学（下）

第一节 心性与造化

——韩孟诗派诗学观 / 206

第二节 兴寄、通俗的融会

——元白诗派诗学观 / 214

第三节 儒佛之间

目 录

——刘柳诗学观 / 223

第四节 清思与苦吟

——贾岛、姚合的诗学观 / 230

第六章 晚唐五代诗学

第一节 对中唐诗学的反拨 / 235

第二节 缘情侧艳与诗词同源 / 251

第三节 感事写意的嗣响与诗学思想的多元化 / 262

第四节 “思与境偕”与“象外之象” / 270

第五节 诗歌批评形态的多样化 / 284

第七章 唐人选唐诗

第一节 唐人选唐诗的酝酿期 / 300

第二节 唐人选唐诗的自立期 / 307

第三节 唐人选唐诗的转化期 / 326

第四节 唐人选唐诗的总结期 / 337

目 录

第五节 唐人选唐诗的类型及其功能 / 346

第六节 唐人选唐诗的意义 / 357

主要引用书目 / 362

第一章 概说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以唐代为主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强盛的封建王朝和丰富的历史内容，无不成为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而诗歌作为该时期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步入了其创作的鼎盛阶段。诗歌创作实践的空前繁荣，也相应地带动了诗学及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使这一时期的诗学从观念到形态都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风貌。总体而言，隋唐五代诗学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占据着十分突出的承前启后的地位。一方面，它对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诗学中“言志”与“缘情”两大潮流的对立运动作出了初步总结，另一方面，它又为宋元以后诗学中“主情”与“主意”两种倾向的分流引发了端绪，从而使自身构成为整个诗学流变过程中的重要的转折枢纽。

第一节 隋唐五代诗学的社会背景

研究隋唐五代诗学，首先必须了解该时期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体状况，把握其影响文学事业发展繁荣的基本特点。那么，以唐为主体的这个历史时期，究竟具有什

么足以区分于其他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呢？从它在整个古代社会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来看，这个时期，正是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变化的时期。可以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带来社会生活的流动和开放，给予人们更多更富于活力的感受。这种特定的时代生活氛围，培育了人们独特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为文化艺术的创造开拓了丰富的源泉，因而也就使这个时期的文学特别是诗歌，达到了繁荣发展的高峰。

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

隋唐两朝的政治、经济变革，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隋灭陈而统一全国后，为巩固政权而制定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隋文帝厘定了新的职官、礼乐、刑律、府兵、科举和度量衡等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南北统一后国家事业的发展。正如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一样，隋文帝创隋制，也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然而，隋朝国祚短促，正当百业待兴之际，隋炀帝的奢侈和暴虐便又把国家拖入了动乱的泥淖。于是，隋亡而唐立。唐初统治者一方面吸取隋炀帝大征徭役、逼民造反的教训，极其重视与民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又在隋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社会改革，完善各项制度。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使国家迅速恢复了元气，文治武功都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唐朝由此走向了兴旺。隋唐两朝社会的整体变革，使之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各历史阶段的特殊面貌。具体而言，也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首先是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改变。我国古代社会封建制

取代奴隶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民和工匠代替奴隶成了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然而，自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逐渐衰落、封建制初步确立以来，奴隶劳动仍然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占据着突出的位置。秦汉时期，无论是官府还是私家，都役使着大量奴婢从事生产性劳动，即使是个体农民，在庄园经济的束缚下，大多实为依附于领主的农奴。直到南北朝，社会上还流行着“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宋书·沈庆之传》）的民谚。而北魏和北齐两次颁布均田令，明确规定奴婢可以计口授田，正说明当时奴隶用于农业生产的普遍性。进入隋唐，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奴婢制虽还存在，但奴婢们已渐渐退出社会生产，多从事于家务劳役。隋初的均田令未见有奴婢授田的规定，而据《隋书·食货志》，有炀帝即位“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的记载，可知文帝时奴婢实际上是授田承担租调的，到了炀帝时才既不授田，也不负担租调。唐初的均田令则正式废除了奴婢授田之制，且自汉以来各代都有的私家荫户，此时允许自立户籍，大批奴婢得以解脱为民；官府手工业也从无偿征役劳动逐渐转向有偿雇用劳动，番匠甚至还可纳资代役，强制性劳役和人身依附关系均较前松弛了许多。这一变化自然有助于提高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

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等级关系的变更。魏晋以降，封建统治集团的职官选举采用的是“九品中正制”，由地方担任“中正”之职的世族豪门铨定人才等级，供朝廷任用。这样一来，选拔人才的权力实质上便操纵在门阀世族手里，所选之人也必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定是世族无疑。而那些不属于这一阶层的庶族寒门，在门阀制度的摧抑下，命运多舛，很难得到进身之阶。这就是说，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等级结构，主要由门阀世族所组成。所谓“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晋书·刘毅传》）。这显然不利于皇权的集中统治。因此，隋代建立之初，文帝就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选举权收归朝廷，并实行打破士、庶界限的科举制，庶族的地位开始上升。但传统的门阀观念仍顽固地左右着隋代的人才选拔，寒门庶族依然未能形成改变政坛格局的力量。是隋末的农民大起义，才给予腐朽的门阀势力以致命一击。唐王朝进一步袭用并完善了隋代创设的科举制，为广大庶族地主和平民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统治集团内部士、庶之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庶族地主终于成为政坛上或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力量。隋唐社会这种封建等级关系的重组，不能不对社会文化心态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三是社会经济结构成分之间比重关系的调整。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无疑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但商品经济即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在我国历史上也有着久远的传统。隋唐之前，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进入市场的商品量也比较低微。隋唐统一天下，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劳动者人身依附的减轻，农业和手工业的渐趋发达，商品经济也就有了极大的发展。隋及唐前期，已形成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商业都会。唐中期以后，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又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商业城市，如扬州、成都、润州、江州、荊州、鄂州、杭州、越州、广州等。而商业城市中都设有固定的交易市场，还出现了初具规模的行会组织。隋代长安设东、西二市，洛阳设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其中丰都市内

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杜宝《大业杂记》）；而唐代长安也设东、西二市，东市“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宋敏求《长安志·东市》）。特别是唐中后期，商业活动不仅突破了场所的限制，出现了大量非正式的“草市”，而且在时间上还打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出现了“夜市”。交易范围的扩大和时间的延长，正是商品经济繁荣兴旺的表征。商品经济的活跃，刺激了社会的物质需求，必然给人们的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带来一定的冲击。唐代社会伴随商品经济成长而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有着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心理习惯和文化风尚，这难免要波及到社会其他阶层，濡染着士大夫文人的精神面貌。

隋唐社会变革，当然不只限于这几个方面，但这些方面却是根本性的。总的来看，这种大规模的变革，使隋唐以前封建社会中积累的许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而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自我更新与全面成熟。处在这一转折、更新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因其丰富的内容必然有助于扩大人们的眼界，充实人们的生活体验，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就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客观条件。

社会思潮的多元及文化心态的开放

隋唐的社会变革，除了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变之外，还包括思想精神与文化心态的变化。而且，这方面的变化对于文学或诗歌发展的作用 and 影响，相比政治、经济关系变革的作用和影响，要来得更直接一些。

儒、佛、道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最有势力的三大思潮。汉魏以来，三种思潮作为封建统治工具之用，相互摩擦碰撞而

又长期并存，故在南北朝时开始统称三教。隋唐之前，三教的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两汉尊儒，排斥其他，使儒学终成士人的传统礼教，此后儒学虽日益衰落，但在政治上总保有佛道二教难以企及的正统地位。道教于东汉初起，奉老子为教祖，却仍被目为邪异，后经东晋葛洪、北魏寇谦之、刘宋陆修静等人的改造，方才确立其地位，为官方所认可。佛教自西域传入，东汉时依附于方术，魏晋时托庇于玄学，东晋以后才渐有自家面目，随即与儒道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南朝，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至梁武帝而被奉为国教，引起儒道联合抗佛。道佛之争，限于夷夏先后之辨，并无实质意义；儒佛之争，则以义理为主，如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同时兼及礼制等问题。这场论争，佛赖政治庇护立于不败，却在义理上亦未压倒儒，而道则落在下风。在北朝，道佛宗教之争常包含政治目的，因而显得比南朝更为激烈。北魏太武帝灭佛兴道，北齐文宣帝又灭道兴佛；而北周武帝则以儒为尊，重道抑佛，曾排定儒先、道次、佛再次的三教顺序。由于佛教徒的极力抗辩斥道，周武帝干脆下令禁止道佛二教，道士和尚一律还俗。可以说，这场延续数百年的三教之争，直到隋唐时期才渐趋缓和与平息。隋文帝执周政，就恢复了道佛二教；即帝位后，更是翻译佛经，令民任便出家，提出三教并重的调和主张。佛道二教借此获得了发展的良机，至唐而达于极盛。

三教并重，符合隋唐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三教自身的互补互进。长期以来，三教的关系大体上是，“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家对道教

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①。隋唐时期，这种状况虽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三教之间的调和已明显多于排斥，并开始由调和走向了融合。唐代儒家一方面排斥佛老，一方面又从学术上不断吸收佛教义理中的思辨哲学因素，以及道家 and 道教有关天人宇宙的思想学说，最终在宋代实现了理学的建构。佛教也一直在寻求与儒调和的可能性，其天台、华严、净土诸宗就已形成适应中国特点的教义，尤其是禅宗，融合儒道二家思想，构造出一种颇合士大夫口味的宗教信仰，在唐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道教素有亲儒的倾向，终唐一代地位又在佛教之上，可在兼容并存的局面下，也能混合周秦阴阳儒墨各家学术，引入佛教禅宗等宗门修法，建立了丹道修炼的中心体系，为唐以下各代所崇奉。

儒、佛、道三教的并重调和，既是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必然反映，也是社会文化心态呈现开放性的具体表现。隋唐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宽弛策略，使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得以兼容互补，自由竞争发展，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隋唐思想文化异彩缤纷的景象和博大精深的品质。这个时期的士夫文人阶层，正是利用这种开放心态和宽容作风，从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广泛吸取精神上的养料，提升着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当中除个别恪守一统、攘斥异端之外，大多随意出入三教之间，修儒服，诵梵呗，求仕进，学仙道，一切任便由己，世人亦不觉有何怪异。在精神气质上，他们既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传统，尤重经邦济世的现实事功，却又轻视皓首穷经的酸腐儒生；他们既向往佛道隐逸避世的生存境界，追求心灵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第554页。

的闲适平淡，然也不乏张扬个性、愤世嫉俗的冲天一怒。他们还仗义疏财，好勇尚武，脱略使气，常常似儒而非儒，似佛而非佛，似道而非道，一任情性，独立自主。因此，这个群体的思想行为中又带有浓厚的游侠气。崇尚侠士，赞扬侠义，且与儒、佛、道三教紧密结合而相互浸染，构成了这一颇具时代特色的任侠精神。社会生活的变革与开放，造就了人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由此凸现出的整个社会的文化风尚和文化心态，为前代所不曾有，亦为后世所不能继。那种昂扬而傲兀的主体意识，无不在该时期的文学或诗歌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可以说，隋唐文学或诗歌的创造，离不开这种社会文化风尚和文化心态的制约与影响。

汉魏六朝文学的扬弃

开放、多元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态，是促进隋唐文学尤其是诗歌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隋唐文学或诗歌的变化出新，还取决于它对前代文学的积极扬弃。扬弃是一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既有承传又有革新的过程。隋唐文学或诗歌，便是在保存和继承前代文学优良传统，批判和改造前代文学积弊的基础上实现其发展高潮的。

先秦《诗》、《骚》并称，共同构成了我国诗歌历史长河的两大源头。由此而下，及于唐诗，中间经历了汉魏六朝这一重要的发展阶段。两汉时期的辞赋、乐府和古诗，在叙事与抒情功能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对后来诗歌创作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建安诗歌则以直抒胸臆与强烈的现实性相结合，词采壮丽又骨气奇高，表现了一种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成为诗歌创作进入自觉历程的标志。此后六朝诗歌更是各擅胜场，呈现出空前活